

我国无罪判决适用现状分析

李晓兰

摘要 无罪判决作为判决的一种类型,对我国的大部分民众来说是陌生的。观察我国的司法活动可以看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被告人能以无罪之身走出审判法庭的廖若星辰,无罪判例由此成为司法判例中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就有学者从我国无罪判例罕见的现状得出了我国人权保障状况较差的结论。对此,笔者并不赞同。本文认为,我国的无罪判例之所以较少出现,跟我国的司法现状和相关法律规定有着密切联系,无罪判例罕见的现状并不必然表明我国人权保障状况较差。本文将从我国无罪判决适用现状及其原因入手,论述我国无罪判例罕见有其合理性及必然性。

关键词 无罪判决 司法活动 法律规定

作者简介 李晓兰,厦门大学法学院2007级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 D9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92(2012)04-122-02

一、我国无罪判决的适用现状

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报告以及笔者所收集的一些基层法院的实证资料来看,我国的无罪判决率偏低,而且有继续降低的趋势。从最高人民法院近几年公布的数字看,全国各级人民法院2003年共审结刑事案件735535件,判处被告人933967人,对不构成犯罪的2467名刑事自诉案件被告人、236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获得无罪判决的被告人占全部刑事案件被告人的0.52%。2004年共审结刑事一审案件644248件,判处罪犯767951人,对不构成犯罪的2996名自诉、公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获得无罪判决的被告人占全部刑事案件被告人的0.39%。2005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683997件,判处罪犯844717人,依法宣告2162名刑事自诉、公诉案件被告人无罪。获得无罪判决的被告人占全部刑事案件被告人的0.26%。2006年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01379件,判处罪犯889042人,共依法宣告1713名刑事自诉、公诉案件被告人无罪。获得无罪判决的被告人占全部刑事案件被告人的0.19%。

为了表明我国基层法院的情况,笔者首先选取了经济和法治水平都较为发达的江苏省为代表。江苏省各级人民法院2004年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42053件,一、二审宣告无罪80人,其中公诉案件6人,自诉案件74人。如果获得无罪判决的80人按照每件案件1人计算,也就是80件案件,占全部案件总数的0.19%,而这0.19%的比例中,公诉案件的比例仅占7.5%。2005年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44506件,宣告无罪58人,其中公诉案件10人,自诉案件48人。如果按照无罪判决案件每件案件1人计算,无罪判决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0.13%。而这0.13%中,公诉案件被宣告无罪的,仅占17.2%。从江苏省各级法院的无罪判决案件看,其中绝大部分是自诉案件,公诉案件占的比例仅为7.5%和17.2%,也就是说,公诉机关起诉到法院的案件,有罪判决率每年都达到了99%以上,极其接近100%。

另外,笔者还选取了其所在的某区人民检察院作为考察对象,研究该院公诉案件无罪判决的适用情况。2003年至2011年期间,某区人民检察院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法院做出的无罪判决为0件,有罪判决率达到100%。

为了与我国的无罪判决适用现状进行比较,笔者收集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无罪判决适用状况的资料。大陆法系国家无罪判决率低于5%,日本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无罪判决率甚至可以达到约1%以下。相形之下,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无罪判决率普遍较高,一般在25%左右,香港裁判法院无罪判决率在45%左右。由此可见,我国的无罪判决率要远远低于英美法系国家,即使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无罪判决率除了与日本较为接近之外,也明显低于其他的大陆法系国家。由此,我们就要深入思考我国的无罪判决率偏低的原因。

二、我国无罪判决适用现状的原因分析

我国的无罪判决率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相比明显偏低,这与我国的司法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在考察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之后,从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了我国无罪判决的适用现状有其合理性。

(一)我国移送起诉的证明标准较高,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完全一致

从两大法系无罪判决率的数据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无罪判决率要远远低于英美法系国家,这主要是由于两大法系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公诉证明标准中,作为起诉的标准一般是“合理根据”,其低于作为定罪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高于作为辩护的“优势证明”标准。英国《1994年皇家检察官守则》则明确规定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即具有“预期可予定罪”所需的充分证据。这里的“预期可予定罪”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现实的定罪可能性。大陆法系国家提起公诉的标准比较严格,例如德国是“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证明检察院有提起公诉的义务”,法国是“有明显的公诉理由”或“控告是否有足够的事实证据”。这说明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院提起公诉时,是需要有事实证据的,这明显比英美法系国家提起公诉的标准要高,但是也低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条确定了我国刑事案件提起公诉

诉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要求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认定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均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各证据之间以及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可以形成有效证据锁链,相互印证,足以得出惟一的排他性结论。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公诉证明标准明显高于英美法系的公诉证明标准,而与其定罪证明标准较为相似。同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公诉证明标准也相对较高,因为根据该标准的要求,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案件的证据必须“足以得出惟一的排他性结论”,而大陆法系大部分国家的公诉证明标准只是要求“有提起公诉的义务”或“有明显的公诉理由”。

为了达到我国法律规定的公诉证明标准,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案件已经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移送法院的证据也“足以得出惟一的排他性结论”。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在被告人作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清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该条确定法院做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完全一致。因此,法院一般不会对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作出无罪判决。一旦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就说明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是错案,必须追究案件承办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为了保证提起公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诉案件承办人会严格审查证据,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据法律规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之后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由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以终止刑事诉讼程序。由此可见,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案件都经过检察院严格审查,完全符合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因此法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作出有罪判决,这也就解释了我国无罪判决率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状。如果我国的无罪判决率和英美法系国家或者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一样高,那学者以及司法界反倒要寻求解决途径了。

(二)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法院会建议检察机关撤诉

为了节省司法资源,对于应当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法院往往会建议检察院撤诉,使该类案件尽早脱离诉讼轨道。而检察院考虑到错案追究等因素,往往也愿意接受法院的撤诉建议。由于撤诉权是公诉权的内容之一,是检察机关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体现,而法院建议检察机关撤诉符合“疑罪有利于被告”等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因此司法实践中法院建议检察院撤诉并不违背人权保障原则。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都有关于公诉案件撤诉条件和撤诉法律后果的相关规定,使得撤诉成为司法实践中现实存在的程序。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现行公诉案件撤诉程序包括以下内容:(1)撤诉的时间: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至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2)撤诉的两种情

形:一为检察机关要求撤回起诉,人民法院裁定是否准许;二为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检察机关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人民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3)检察机关要求撤诉的条件是: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4)撤诉的法律后果: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不得再行起诉,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5)撤回起诉应当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以书面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于撤诉程序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及具体的操作方法,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建议检察院撤诉,而不会让这类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并最终作出无罪判决。这也是我国无罪判决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我国特有的诉讼结构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在纵向上具有一种特定的诉讼结构模式。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侦查、起诉、审判这三个环节上通过互相配合和互相补充的活动共同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上,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各自相对独立地从事诉讼活动,各自在某一诉讼阶段上充当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司法机构,各自在其诉讼阶段拥有完全的权力。对于审判程序而言,法院在最终作出判决时要依靠指控方在审判前、审判过程中以及法庭审理后相继移送的书面案卷材料。法院实际上处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最末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送到法院面前的几乎是一个“成品”,法院面对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几乎是必然要作出有罪判决的。因为那些明显无罪的案件,检察机关会在提起公诉阶段决定不起诉,即使检察机关没有作出不予起诉决定,法院为了节约诉讼资源,也会将案卷材料退回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作出不予起诉决定,而非由法院最终作出无罪判决。而那些证据不足的疑罪案件,法院通常也不愿意作出无罪判决,部分法院会作出所谓“留有余地的判决”,部分法院会建议检察院撤诉。这也是我国无罪判决率偏低的一个原因。

总而言之,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决定了我国无罪判决率偏低的现状,而这一现状并不是我国人权保障状况差的体现。由于法律、司法解释的频繁修改和补充,办案人员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案件事实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司法机关对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的要求和具体把握不尽相同,人们认识事物的水平和能力有局限性,无罪判决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是司法认知活动的必然产物,并不违反诉讼活动的规律。但无罪判决率高并不必然表明人权保障的状况好。为了追求人权保障的高水平而无原则地提高无罪判决率,违反了唯物辩证法,也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状况不符。因此,对我国无罪判决率偏低的现状应当抱以科学、理性的态度,认识到这一现状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 [2]陈光中:陈学权:中国语境下的刑事证明责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2)。
- [3]徐美君:我国刑事诉讼运行状况实证分析,法学研究,2010(2)。